

◀（上接 4 版）

频率最高的词语，有 196 次之多。柳田指出，“人”在汉语里具有一般意义，也有经过历史的演变而形成不同的含义；在佛教指众生，在西欧指人文主义等。然而，在《临济录》中，则是一个带有特殊问题的词语。柳田列举三个用例进行论述。第一例是“是你即目前听法底人”，第二例是“即今识取听法底人”，第三例是“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底人”。柳田认为，这几处出现的所谓“听法底人”，实际上就是指“眼前每一个人当下都是佛，都是祖，都是绝对的理想人格”。

柳田还指出，临济的这种“人”思想的独自性，还表现在“祖佛”一词上。柳田认为，一般使用较多的是“佛祖”“佛”“祖师”，而“祖佛”一词并不多见，这很可能是由临济新造的词语，意思就是指当下眼前听法的每个弟子，除此之外，更无二人，临济又称其为“活祖”。而更为鲜明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柳田认为是所谓“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的说法。“无位真人”，就是指临济说法的对象，因此，他既不是一种内在的原理性的存在（法性），也不是一种什么理想的可能性的存在（佛性）——“不是别的，就是现在听临济说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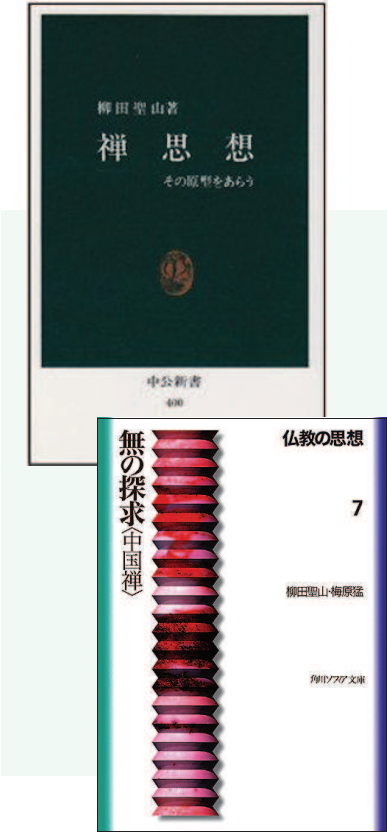
基于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柳田批判之前日本出版的某些关于《临济录》解释和讲义等书籍的读法不够准确，比如把“你面前”读作“你的面前”等，认为它们未能理解临济的真意。另一方面，柳田不满于通行的《临济录》的内容，认为它不够“真实”，未能“真实地”反映临济义玄的思想，因此，需要寻找一个他认为最能反映临济义玄“人”思想的《临济录》的版本。柳田表白他的心情，指出，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接触到生活在唐末的临济义玄其人的气息，倾听他鲜活的声音，而最大的兴趣，在于了解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临济义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柳田认为，必须弄清《临济录》版本的成立情况。

关于《临济录》的成立情况，一般以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福州鼓山圆觉宗演重开的本子视为“祖本”。也就是说，现在通行的《临济录》是在临济义玄离世二百五十年之后成立的著作。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其流传情况到底如何呢？既然是“重开”，说明在此之前曾有过一种本子的存在。它是单行本？还是收入丛书之中的本子呢？柳田经过考察推测说，宣和本经过了宋代人的修正，卷首的马防的序以及本文的编辑，反

映了宋代人的问题兴趣。同时，通过比较《四家语录》和《天圣广录》卷十、十一所收临济语录，认为宗演“重开”时的底本应该是《四家语录》（最初的编辑为北宋初期）所收本，而《天圣广录》临济章的底本也应该是《四家语录》。也就是说，《天圣广灯录》的本文，其实可以认为就是北宋《四家语录》所收的《临济录》。非常幸运的是，宋版《天圣广灯录》保存在京都知恩院收藏的开元寺版大藏经之中，而柳田本人亲自对它进行了考察。这样一来，经过多年来寻找的“接近临济义玄其人的鲜活的声音”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了。

柳田通过对宗演重开的《临济录》与《四家语录》的比较考察，发现重开本在本文中新增了八段文字，而且在排列顺序上也相异。但内容完全一致，中间较长的示众部分，在文章和排列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柳田认为，这新加的八段文字，是宗演在宋初的《四家语录》的基础上，做了排列上的变动，新加了八段，这无疑是宗演的创意，“反映了宋代临济禅的兴趣”。那么，宋代临济禅的兴趣在哪里呢？柳田认为在于一种格式化：“也就是说，一直以一种出奇地落落大方的方式、自由地生活的临济的语言，在所谓宋朝禅的体制内被重新解读了。”因此，柳田指出，宗演重开的《临济录》虽然成功了，但“重开”是一种“改编”，而“改编”，是一种“体制化”，它带有浓厚的“宋代禅的臭味”。而且，柳田认为，这种情况对之后影响深远，或者进行“特色化”，或者进行“格式化”，或者进行“定型化”等。比如智昭在《人天眼目》中，将《四家语录》中不太被人注意的“三玄三要”“三句”“四喝”“四宾主”“四料简”等部分，视为临济的“家风”，予以“特色化”；圆悟在《碧岩录》中，对于涉及临济的部分方面，也极其“格式化”；至于南宋末期的《无门关》，虽然没有关于临济的文字，但第一则关于赵州无字公案的评唱，就出现了“杀佛杀祖”的句子。柳田认为，这些都是“颇为概念化”的举动。总之，柳田认为，宗演之后，“《临济录》逐渐作为古典而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被束之高阁，只有一些被选择出来的定型化的句子，成为脍炙人口的结果了”。

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柳田同时还把临济义玄与《临济录》所载的普化的“疯狂”相提并论，说如果说普化是“疯狂”，那么临济可以说是“疯



癲”；“疯癲”一词，其实就是为临济所准备的；“疯癲临济”，比起作为临济禅之祖的内涵还要广大。柳田指出，《临济录》的魅力除了在于临济义玄的自由、豪迈、开放的赤裸裸的“人”思想外，还在于该书关于普化的“疯狂”的叙事；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省去了普化的“疯狂”的叙事，《临济录》的独自魅力将会减掉一大半。在柳田看来，普化其实就是临济义玄所主张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者，是临济禅的典型，或者说，临济千言万语的教说，可以与普化轻快的一脚相等值。因此，柳田认为，《临济录》所叙述的普化与临济，实质上具有密切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尽管关于普化的记载也存在着问题，不同文献之间出现的记载之不同，无疑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某种意图。

总之，柳田对临济义玄如此情有独钟，把临济义玄与有着戏剧性色彩人物的普化相提并论，是因为在柳田看来，临济义玄赤裸裸的“人”思想和普化的“疯狂”叙事，其实反映了一种禅思想的“原型”。柳田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禅思想——その原型をあらう》（中央公论社，1975 年）一书中窥其一斑。该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从章名“髑髏の章”“镜の章”“轮回の章”“疯癲の章”这些文字，我们不难了解，柳田对于“禅思想”的理解，有他自己的特色。在该书“疯癲の章”中，柳田着重论述了作为“疯癲的临济”和作为“疯狂的普化”的形象，认为他们“破格”的言行，其实就是禅思想“原型”的一种赤裸裸的表达。“无拘无束”

柳田对临济义玄如此情有独钟，把临济义玄与有着戏剧性色彩人物的普化相提并论，是因为在柳田看来，临济义玄赤裸裸的“人”思想和普化的“疯狂”叙事，其实反映了一种禅思想的“原型”。柳田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禅思想——その原型をあらう》一书中窥其一斑。

“自由奔放”的临济和普化的形象，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去体制化”的“人”——“无位真人”、“无依道人”。柳田通过对临济的“寻梦”，找到了禅思想“原型”的存在。因此，柳田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禅思想“原型”的一次思想历程；柳田的临济叙事，有他本人独自的问题意识。

一位精神孤独的禅宗学者

柳田圣山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禅宗学者，他擅长禅宗文献的梳理，特别是在初期禅宗文献的历史研究方面，如前所述，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柳田又是一位富有思想个性的禅宗思想史学者，他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长达二十余年的“寻梦”，可以说如实地反映了他在禅宗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奋斗历程。

然而，柳田关于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柳田正式发表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之间，而开始着手研究，似乎时间更早，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他回忆自己研究临济的动机时，明确指出他结合河北的历史地理环境，试图重新解释临济义玄，是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为了抬高战意的一种反省”；阅读《临济录》，目的是“以摆脱战争中的

咒符”，而且，还说，“临济以及《临济录》，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票据”，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柳田关于临济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叙事、批判宋代临济禅的“格式化”、重唐轻宋、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到唐末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临济义玄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呐喊者，赤裸裸的“人”思想的表达者，不能不说多少也参杂着柳田对临济的一种想象；就像他评价铃木大拙的临济解释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一步，并不是什么临济的思想”一样。

柳田圣山基于自己独自的问题意识而对临济义玄禅学的“自由理想人格”的想象和关于《临济录》的“寻梦”，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客观的映照。柳田在前述《禅思想》一书中这样叙述他对自己寺院出身的身世和现代化日本社会世态的看法，指出他很早就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厌恶，曾不只一次地憎恨，下决心什么时候偷偷地离寺出走，还一度决意以参加战争来清算如此无用的自己——许多朋友战死在沙场，自己却被留下；青春时代，曾一度阅读过的《资本论》《精神现象学》、克尔凯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然而自己心量狭小，与这些长期无缘，而唯有宿命性地注定自己出身的禅的传统，是自己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柳田感叹经济高度增长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说自己曾经在禅寺中感到的相同的空气，现在业已扩散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还说，故乡也不复存在，曾经是墓地的山岭遭到削割，汽车所排放出来的气体使树木绿叶惨遭伤害，乡下也不是公害列岛的世外桃源；水俣的病菌已进入村庄的友人们的家庭之中，等等。结合柳田这些心灵独白式的文字，我们对于柳田之所以将毕生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寻梦”《临济录》的思想背景，似乎并不难理解。在宗教与学术、僧侣与学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柳田感到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促使他在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孤独感，而《临济录》中所塑造的“疯狂”临济和“疯癲”普化的形象，便给他孤独的精神带来了慰藉，成为他向往的对象和讴歌的偶像。柳田对《临济录》的一系列的“格义”，其实是一位思想孤独的禅宗学者的心灵写照。

（作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